

台灣半世紀以來快速經濟 發展的回顧與省思

梁明義、王文音*

- I. 前言
- II. 台灣經濟發展階段性的回顧
- III. 台灣經濟的幾項特徵
- IV. 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
- V. 中國儒家思想與傳統的影響
- VI. 結語

*作者分別為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東南技術學院工管系講師。
本文的撰寫承蒙葉萬安、陳博志、朱敬一、石田浩等諸位先進與同仁提出寶貴建議，作者謹致謝忱。

I. 前言

台灣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由一個落後、拮据的殖民地經濟，快速成長蛻變為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開創了經濟發展成功的典範，與南韓、香港、新加坡共譽為「亞洲四小龍」。

就人類歷史眼光來看：

第一，像四小龍這樣，由一個典型的未開發經濟，以每年約 10% 的實質經濟成長率⁽¹⁾，在短短二、三十年間，快速「起飛」而達相當寬裕的生活水準，在人類歷史上可說是空前未有的經驗。歐美先進國家是經過一、兩百年間，以每年 1-3% 的成長率，慢慢發展長期累積起來的。日本與西德在戰後也有相當快速的成長，而被稱為「經濟奇蹟」；但日本與西德在戰前已是先進國家，其戰後的快速成長算是破壞後的「重建」，因此就本質上而言與四小龍頗不相同。

第二，我們也可說，亞洲四小龍的快速經濟發展直接、間接地促進了共產制度在蘇聯與東歐地區的瓦解。在戰後的冷戰對峙中，西方國家生活水準不斷提昇，與共產陣營及其他落後地區國家形成明顯對比。蘇聯共黨官方說法總強調這是「美帝國主義」對外經濟侵略的結果。他們煽動這些落後國家建立共產政權，宣稱唯有西方方式的資本主義崩潰，落後地區國家才有「翻身」的機會。

然四小龍的實際表現使蘇聯共黨官方說法越來越站不住腳 -- 在此我們有落後經濟快速發展成功「活生生」的實例，不是抽象理論爭辯或帶有政治意味宣傳所能掩蓋的。隨著時間進展，越來越多落後地區國家，或甚至共產陣營國家，紛以四小龍為學習模仿對象。當然，最後共產制度開始崩潰最直接的導火線，是東、西德的對比與柏林圍牆拆毀事件。然而四小龍的表現也具有相當的影響與推動力量。

回想在 1950 年代初期，台灣所處環境十分惡劣：（1）國民黨

政府剛從大陸挫敗下來，政局不穩，人心惶惶。（2）自大陸擁入軍隊與難民使人口由 650 多萬暴增為 800 多萬。（3）台灣自然資源貧乏，整個經濟以生產糖、米的農業為主，經濟基礎脆弱。（4）政府軍事支出負擔沈重，財政基礎亦相當薄弱。（5）金融體制不穩固，通貨膨脹嚴重。（6）民生物資短缺，國際收支巨額逆差，外匯不足。

若與當時其他落後地區國家相比，台灣要發展經濟的條件顯然是相當不利的。然而台灣卻能克服這些困難，脫穎而出，在 1960 與 1970 年代創造出空前的經濟奇蹟。有關這段「蛻變」的成因與過程，文獻上已有不少論述。本文擬跳脫傳統上比較狹隘的經濟層面分析，而從歷史概觀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來對台灣的快速經濟發展做一回顧與省思。

我們將對整體 48 年期間 (1953 - 2000) 做一綜合的階段性回顧 (第 II 節)，並歸納出幾項台灣經濟的重要特徵 (第 III 節)。由這些回顧，可看出台灣發展成功的關鍵在於 1958 年政府當局開始一連串改革措施 -- 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要吸引外資、促進出口，並鼓勵國內儲蓄與投資。就決策者而言，是想要解決當時一些急迫性的問題，如外匯短缺、資金不足以及農村過剩勞動力等。然這些政策的實施，再配合當時一些外在有利條件，尤其是與日本、美國的特殊密切關係，卻塑造了一個「出口帶動」的經濟發展型態，開創人類歷史空前未有的一段發展經歷。這或許是當初政府決策者始料未及的！

除上述所提政府政策及國際間有利的外在因素外，尚有一些社會歷史 (socio-historical) 的力量，交錯影響，也有助於台灣這段時期的經濟起飛。本文就日本殖民統治 (第 IV 節) 及中國儒家思想與傳統 (第 V 節) 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提出討論。

II. 台灣經濟發展階段性的回顧

1945 年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此時由於戰爭時期的破壞，生產力未恢復，隨即又捲入國共內戰的漩渦，台灣經濟極為紊亂，通貨膨脹尤其嚴重。接著國民黨挫敗，大批軍隊、難民擁入台灣，局勢更加不安定。1950 年韓戰爆發，美國把台灣納入圍堵中共體制的一環，美援開始抵達，局勢才慢慢穩定下來。從 1945 年到 1952 年可說是「混亂調整時期」。1953 年政府開始實施「第一期四年經建計畫」，大部分學者分析台灣經濟發展多以此年為開始。

從 1953 年以來，台灣的經濟發展事實上經歷許多不同階段，每階段各有其特色。我們承續葉萬安（1976、1999）的研究加以延伸到 2000 年，而將這 48 年的經濟發展過程分成下列五個階段：

1. 第一階段，1953 - 1960，為第一、二期四年經建計畫期間，稱為「依賴美援時期」。
2. 第二階段，1961 - 1972，是典型的四小龍快速成長期間，稱為「自力成長與經濟起飛時期」。
3. 第三階段，1973 - 1984，經歷兩次能源危機，稱為「遭遇國際經濟驟變時期」。
4. 第四階段，1985 - 1992，台幣由 40 對 1 美元升值到 25 對 1 美元，稱為「台幣大幅升值與調適時期」。
5. 第五階段，1993 - 2000，與大陸關係逐漸加溫，稱為「兩岸經濟關係日益密切時期」。

現就這五時期的一般經濟情勢分析如下：

(一) 依賴美援時期 (1953 - 1960)

1953 年政府開始推行第一期四年經建計畫，此時台灣與當時大多數未開發國家一樣，面臨許多經濟方面的困境：

1. 由大陸湧入大量人口，失業問題嚴重。

2. 政府除了要應付沈重軍事負擔外，由於人口增加，教育與公共衛生支出膨脹，財政赤字嚴重。

3. 台灣自然資源貧乏，生活必需品、能源以及農工生產所需的原料、機器設備等仰賴國外進口供應。而出口主要以糖、米等農產品為主，非常有限，國際收支有巨額逆差。

就在這段期間，美國的經濟援助適時發揮極大作用。從 1951 年開始，到 1965 年 6 月底止，前後 14 年半的期間，台灣接受美援總數 14 億 8 仟多萬美元，平均每年約 1 億美元。

在此援助下，台灣進口大量物資，包括民生必需品、農工原料與機器設備等，使物價逐漸穩定。若以當時經濟規模，每年總出口約在 1 - 2 億美元，因此每年 1 億美元援助所占比重甚高，實為彌補外匯不足的重要關鍵。同時美援物資出售所得之價款，一部分支援政府財政，一部分貸於農工建設做為投資，也彌補了投資資金的不足。

依 Neil Jacoby (1967) 估算，美援在這段期間對台灣資本形成貢獻約占 31 - 34%，每年平均彌補國際收支逆差達 91%，而使台灣經濟成長率提高約一倍。

表 1 數字顯示台灣在這一時期經濟成長率每年平均 7.6%，是相當不錯的表現；通貨膨脹率每年平均 9.4%，比先進國家要高出許多，但比起 1953 年前的惡性通貨膨脹，有明顯改善。台灣可說是戰後美援成功的少數模範之一。

表 1 台灣幾項重要經濟指標

單位：%

期間	實質經濟年成長率	通貨膨脹率	出口占 GDP 比例	儲蓄率
1953 - 1960	7.6	9.4	9.6	9.9
1961 - 1972	10.2	3.9	24.0	21.5
1973 - 1984	8.4	9.4	49.7	32.3
1985 - 1992	8.2	2.5	51.4	32.1
1993 - 2000	6.2	1.5	47.7	26.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所得』

註：1. 實質經濟年成長率是 real GDP 年成長率。

2. 通貨膨脹率是 GDP 平減指數 (implicit GDP deflators) 年成長率。

3. 毛儲蓄率是儲蓄毛額 (Gross Saving) 對 GNP 之比例。

(二) 自力成長與經濟起飛時期 (1961 - 1972)

這是最令人矚目的典型四小龍「經濟起飛」時期。在長達 12 年期間，每年經濟成長率平均 10.2%，而通貨膨脹率僅為 3.9%。能有如此快速成長，物價相對穩定，且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正是本文所強調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經驗。

在前一階段「依賴美援時期」，台灣所遭遇的困難因美援而獲得部份解決，特別是在外匯短缺與投資資金不足方面。但政府也知道不能長久依賴援助，必須未雨綢繆準備美援隨時可能中止。而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農村部門開始有剩餘勞動力，這也是必須解決的問題。於是政府從 1958 年 4 月開始採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較重要的有：

1. 推動外匯改革，尤其在 1960 年 7 月 1 日達成單一匯率，將匯率固定在台幣 40 元兌換 1 美元。此單一匯率的實現對於剛起步的出口產業提供穩定而有利的發展條件。而該匯率一直維持到 1973 年 2 月才首次升值 5%，這在未開發國家中是很難得的成就。

2. 1960 年 9 月訂定「獎勵投資條例」，以減免租稅方式來鼓勵儲蓄、投資與出口，並排除種種對資本形成或出口不利的因素。

3. 1966 年在高雄港設立「加工出口區」，吸引外人來台灣投資設廠。由於相當受歡迎，很快達到飽和，於是又選定台中潭子與高雄楠梓來增設兩個加工出口區。

基本上這些措施是為了解決當時外匯短缺、資金不足與農村勞動力過剩等急迫性的問題；而其著眼點都是在於吸引外資、促進出口，並鼓勵國內的儲蓄與投資。其結果使出口產業蓬勃發展，造就了一個「出口帶動」的經濟發展奇蹟。在這 12 年期間，台灣的出口金額從 1961 年 1.9 億美元至 1972 年增至 29.9 億美元，足足增加了 15 倍，平均每年成長率高達 28.1%！

有關這一時期的發展，我們特別強調下列幾點以便加深對台灣經濟的瞭解：

第一，1966年「加工出口區」的設置在當時是一項創新。本質上是在臨海地區設立以加工出口工業為主的免關稅特殊工業區。在區內行政手續簡化，所有進口原料、零件、機器設備免關稅，出口也不必辦退稅。以此吸引外人投資設廠，在當時是為了要解決外匯、資金短缺及農村過剩勞動力等急迫性問題。但事後執行結果，引進國外甚多新技術與工廠管理辦法，長期而言對國內工業技術提昇有相當的擴散作用。直到今日，這三個加工出口區仍在運作，而這個制度也廣為國際間所模仿採用。

第二，日本經濟從1955年進入高速成長期，到了1960年代中期有了大量外貿出超。此時日本面臨兩個問題：一是其國內工資迅速上升，生產成本劇增；二是由於對美國商品輸出增加迅速，導致美國設置關稅或非關稅壁壘。因此日本的紡織和電子公司為了利用台灣低廉工資和突破美國限額限制，紛紛將耗費勞力多的生產製程搬到台灣，加工後運回日本；或將半成品、零件運到台灣加工裝配，貼上台灣製造標記，再轉銷美國⁽²⁾。

1966年台灣設置「加工出口區」正迎合日本利用台灣廉價勞動力在台灣建立加工裝配基地轉銷美國的實際需要。如此台灣在市場上依賴美國，在生產上依賴日本，三者逐漸形成一個密切的「三環貿易結構」。而在這一過程中，台灣貿易收支也逐漸顯現對日逆差、對美順差的現象。

第三，美援於1965年中止。但大約在此同時，越戰戰情升高，台灣積極爭取越南美援在台灣採購物資，因而對越南出口迅速增加。以1966年統計來看，台灣對越南輸出達美金8,600萬元，在當年出口中僅次於對美國與日本的輸出而居第三位，占出口總值16%。若依越南官方統計，台灣高居供應國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因此我們可說，越戰所引發的物資需求在台灣經濟起飛時期，也扮演

了相當程度的促進角色。

第四，除了政府政策與國際間一些有利因素外，促成台灣經濟起飛的一個基本重要條件，乃是大量工資低廉而素質高的勞動力。隨著經濟發展，台灣農村部門開始湧出剩餘勞動力。這些勞動力不僅數量多，工資低廉，且接受普及教育而素質高。若與國際間比較，台灣當時的製造業的每小時工資只有日本的 1/4，美國的 1/22⁽³⁾。甚且在當時威權統治下，工會活動受到約制，勞動爭議被禁止。這些都是吸引外資的極大誘因，也是支撐出口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我們可說，在 1960 年代經濟起飛時期所建立的產業是以廉價勞力為基礎的勞力密集型出口產業為主。

(三) 遭遇國際經濟驟變時期 (1973 - 1984)

1973 年 10 月第一次能源危機發生，原油價格由每桶 2 - 3 美元劇漲至每桶 11 - 12 美元，引起全球性不景氣與通貨膨脹，即所謂「停滯性膨脹」(stagflation)。台灣受此國際經濟驟變影響，經濟成長率由 1973 年 12.8% 下降到 1974 年 1.2%；通貨膨脹率則於 1973 年跳至 15%，1974 年更達 32.4% (見表 2)！

1974 年與 1975 年是兩年艱苦因應時期，到了 1976 年才算調適完成，並再度展開連續 3 年的快速經濟成長 -- 1976 年 13.9%，1977 年 10.2%，1978 年 13.6%。

1978 年年底，伊朗政變，石油減產，油價再度攀升，每桶漲至 24 美元。1980 年兩伊戰爭爆發，油價又上漲，至該年年底每桶達 41 美元。1978 - 1980 年的第二次能源危機再度引起全球性「停滯性膨脹」。台灣也再度受到衝擊，直到 1984 年 (經濟成長率 10.8%，通貨膨脹率 0.9%) 才完全擺脫能源危機的陰影。

綜合這 12 年期間，台灣經歷兩次能源危機，都能成功調適而回復雙位數快速經濟成長。然若進一步分析，可發現前後兩次能源危

表 2 台灣重要經濟指標之逐年統計，1971 - 2000

單位：%

期間	實質經濟 年成長率	通 貨 膨 脹 率	出口占 GDP 比例	儲蓄率
1971	12.9	3.0	35.6	28.7
1972	13.3	5.8	42.3	31.9
1973	12.8	15.0	47.2	34.4
1974	1.2	32.4	43.9	31.4
1975	4.9	2.3	39.6	27.1
1976	13.9	5.4	47.5	32.7
1977	10.2	6.3	48.9	33.0
1978	13.6	5.3	52.4	34.7
1979	8.2	11.5	53.3	34.0
1980	7.3	16.2	52.5	32.6
1981	6.2	12.1	51.9	31.9
1982	3.6	3.4	50.1	30.4
1983	8.4	1.9	53.1	32.1
1984	10.6	0.9	56.2	33.4
1985	5.0	0.6	54.2	32.9
1986	11.6	3.4	58.1	37.3
1987	12.7	0.6	57.3	37.9
1988	7.8	0.9	54.3	34.4
1989	8.2	3.3	49.6	30.9
1990	5.4	3.8	46.8	28.1
1991	7.6	3.8	47.4	27.8
1992	7.5	3.2	43.5	27.3
1993	7.0	3.6	44.1	27.8
1994	7.1	2.0	43.6	27.1
1995	6.4	2.0	48.0	27.0
1996	6.1	3.1	47.4	26.6
1997	6.7	1.7	48.3	26.4
1998	4.6	2.6	47.8	26.0
1999	5.4	- 1.4	48.3	26.1
2000	6.0	- 1.6	54.2	25.4

資料來源：同表 1

機，政府的因應對策是很不相同的。分述如下：

首先，第一次能源危機發生，對政府當局是極大的震撼。這是前所未有的經驗。當時主要經濟政策是 1974 年所展開的「十大建設」：包括建立鋼鐵、石化、造船等重工業，並推動興建核能電廠、高速公路、國際機場、國際港口以及鐵路電氣化等基本公共設施。

事實上，「十大建設」是在能源危機發生之前已著手規劃推動。然隨著能源危機的發生，這十項重大投資適時發揮了兩方面作用：（1）如此大量的公共支出在經濟極端不景氣時發揮了凱因斯式 (Keynesian) 的激勵效果，協助帶動景氣恢復。（2）1960 年代的經濟起飛是以發展勞力密集型輕工業為主。然隨著經濟發展，工資上升，慢慢難與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地區更低廉的勞力競爭。政府推動鋼鐵與石化工業乃要發展資本密集型重工業，以促進產業升級。

到了 1979 年，「十大建設」一一陸續完成，對於建立鋼鐵、石化重工業也有初步成果。但隨著油價再度大幅上漲，政府也覺察到不能再發展耗費能源的重化工業。如要維持台灣經濟像以往一樣的衝力，必須要發展節省能源和原材料的技術密集型產業。有了這樣的瞭解與構想，政府乃於 1979 年頒訂「經濟建設十年計畫」，選定機械工業（包括一般機械、電機、精密與自動化機械等）與電子資訊工業（包括電腦軟體、微電腦及週邊設備、數據通訊及相關電子工業）等「策略性工業」，亦即將來所要鼓勵發展的重點工業。至於鋼鐵、石化等能源密集度高的重工業，其發展目標僅以充裕供應國內需求為重點。

在這樣的政策方針下，政府一方面主導設立「資訊工業策進會」、擴充原有「工業技術研究院」，並於 1980 年設置「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這是繼「加工出口區」後另一個劃時代的重要創制。「科學工業」是指「製造及研究發展高級技術產品之事業」，設置科學工業園區宗旨是「引進高級技術工業及科學技術人才，以激勵

國內工業技術之研究創新，並促進高級技術工業之發展」。

「加工出口區」的設立雖使台灣的工業發展向前邁進一大步，但終究停留於從「加工」到「出口」的勞力密集型工業型態。「科學工業園區」則是為了吸引外國高科技產業來設廠投資，進而引導台灣科技走向整合、改進與創新之路。其基本構想乃是要吸引外資建立美國矽谷式「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基地。

如此，進入 1980 年代，台灣產業結構進入技術導向發展階段。在政府大力推動下，電子、資訊、半導體與通訊產品逐漸具有規模，而成為最大出口產業。資訊工業可說是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帶動台灣經濟發展的新力量。

(四) 台幣大幅升值與調適時期 (1985 - 1992)

從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台灣的工業發展由勞力密集輕工業成功地轉型為技術密集高科技工業型態。然整體而言，這都是「出口導向」的工業發展。在這二、三十年間，台灣的出口占 GDP 比例逐年上升。到了 1984 年，當台灣經濟擺脫第二次能源危機的陰影而再度創下 10.6% 的雙位數經濟成長時，其出口占 GDP 比例竟然高達 56.2% (見表 2)。而在該年這麼大量的出口中，幾乎有一半 (48.8%) 是出口到美國！

而美國方面，在 1980 年代開始經歷大量外貿逆差，因此對其貿易伙伴國有順差者，包括日本及亞洲四小龍，施加貨幣升值壓力，希望能改善其國際收支情況。台幣在美國壓力下，從 1985 年 10 月以 40.4 元兌換 1 美元開始升值，到 1992 年 6 月為 24.8 元兌換 1 美元，升值幅度高達 38.6%。

對於這一時期的經濟情勢，我們可綜合幾點：

1. 台幣大幅升值削弱對美國的出口競爭力，而美國是台灣最主要出口市場。結果出口占 GDP 比例從 1986 年 58.1% 逐年下降到

1992年43.5%。對於以「出口帶動」來創造快速成長的台灣經濟而言，自然會有不良影響。自1988年以來，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擺動於5-8%之間，未曾再有經濟起飛時期那種雙位數字的成長。不過跟世界其他國家比起來，這仍是相當不錯的表現，顯示台灣經濟體質已有相當程度的成熟性與韌性。

2. 由於貿易順差擴大，政府在這段期間開始提出「自由化」與「國際化」為整體經濟政策的大方向。其中較重要的措施包括：大幅降低關稅，擴大開放進口，至1992年平均實質進口關稅已降至5.1%；推動外匯自由化政策，於1987年修正「外匯管理條例」，逐步解除外匯進出限制。而自1949年以來所實施的「戒嚴令」也於1987年解除。這種種開放性措施，再加上台幣升值提高了對外國商品的購買力，乃帶動台灣民眾國外旅遊與台灣廠商進行海外投資的熱潮。台灣進一步邁向更開放、更成熟、更類似先進國家的經濟型態。

3. 貿易順差擴大，貨幣供給額大幅增加，再加上國外「熱錢」流入，結果過剩資金造成房地產與股票價格暴漲，引起金錢遊戲狂潮。台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從1985年約750點起漲，到1990年2月10日達（迄今仍是歷史最高的）12,682點！此種以股票和土地炒作為特點的泡沫式經濟，並不利於整體經濟的安定。早在1989年初，當股價指數超過6,000點時，政府即斷定這並非健康現象，而於該年4月開始採取緊縮措施：中央銀行在4月1日將重貼現率從4.5%調高為5.5%；8月23日更調高到7.75%。如此迫使貨幣供給額（M1B）年增加率自30%以上，降至個位數，甚至於1990年3月起開始呈現負成長。

在此強烈緊縮政策下，股價指數自1990年2月10日頂峰12,682點開始下降，於該年10月1日降至谷底2,485點。短短不到一年內，跌掉一萬多點，下跌幅度高達80%！於是台灣經濟的「泡沫現象」乃有相當程度的破滅，致使當年經濟成長率自1989年的8.2%下降為5.4%。然隔年開始連續4年快速反彈恢復到7%以上 --

1991 年 7.6%，1992 年 7.5%，1993 年 7.0%，1994 年 7.1%。

事後回顧，如當時政府不採取「壯士斷腕」的強烈緊縮措施，而任由股市像日本一樣飆漲到二、三萬點以上再破滅，則整體經濟所受傷害將更深，勢必無法如此迅速復元。而自 1991 年以來，台灣經濟恢復穩定成長，「泡沫現象」多多少少在可掌控範圍內。因此 1997 -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時，台灣所受到的影響要比其他國家來得小，而能安然渡過。可見政府在 1989 - 1990 年主導提前將泡沫破滅，迅速恢復穩健成長所採策略應屬正確。

(五) 兩岸經濟關係日益密切時期 (1993 - 2000)

進入 1990 年代，台灣經濟發展最明顯特色是與大陸關係日益密切，不管是雙方商品貿易或台商在大陸的投資都有驚人成長。

以歷史的眼光，我們可從幾方面來看這一個趨勢：

1. 1949 年以後台灣與大陸隔絕，僅經由香港進行一些中藥材等土特產品的間接貿易，數量很少。1979 年中共政府為了促進統一大業早日實現，提出結束海峽兩岸軍事對峙狀態，海峽兩岸恢復通航、通郵、通商，探訪親友，旅遊參觀和進行文化體育交流等。從此以後，儘管台灣堅持反對「三通」，間接性三通開始有很大進展，而經由香港轉口貿易發展尤為迅速。

以統計數字來看，台灣出口到香港（事實上大部份轉口到大陸）占總出口比例在 1985 年為 8.3%，到 2000 年則達 21.1%。另一方面台灣出口到美國占總出口比例在 1985 年為 47.7%，到 2000 年降為 23.5%。就 1993 - 2000 年整個 8 年期間，台灣出口到美國占總出口比例仍是第一位，占 24.9%；然同一期間出口到香港占總出口比例已有 22.4%，即將超越美國而成為台灣的最重要出口市場。第三位日本僅占 10.4%。

2. 在 1987 年以前，台灣實行外匯管制政策，海外投資甚少。

1987 年政府放寬外匯管制、解除「戒嚴令」，並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同時大陸於 1988 年公布「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在已逐漸加溫的商品貿易上，掀起一波一波的「大陸投資熱」。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大陸加快改革開放的腳步。1994 年又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台商投資保護法」，進一步提高了對台商投資及其合法權益的保護層次。於是台灣在大陸的投資在 1990 年代乃有飛躍式成長。

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基本上是以轉移島內勞力密集型產業為主，因此帶動了大量的機器設備與原料的進入，使兩岸貿易額急劇擴張。這些產品在大陸加工、裝配後再輸往美國。這個過程與早期日本在台灣投資設廠情況非常類似。我們可說在 1960 年代以來所逐漸形成的日本 - 台灣 - 美國「三環貿易結構」，在 1990 年代也開始形成類似的台灣 - 大陸 - 美國「三環貿易結構」。

3. 從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 40 年期間，美國與日本毫無疑問是與台灣經貿關係最密切的兩個國家：不管是出口、進口、投資金額等，在統計上都分居第一、二位而遠高於其他國家。然進入 1990 年代，大陸與台灣的經貿關係密切已逐漸與美國、日本鼎足為三，甚有超越而位居首位之勢。台灣與大陸地理位置相近，又有相同的語言文字、生活習俗與文化背景。此種地理人文密切度，是任何其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台灣經濟在未來如何發展，與大陸經濟的互動關係將是一重要關鍵。

III. 台灣經濟的幾項特徵

回顧台灣經濟發展，我們可歸納出有關台灣經濟的幾項特徵。經由這些特徵，或許可對上述各階段發展中的一些現象有進一步瞭解。

(一) 出口占 GDP 比例非常高

由表 1、表 2 可見，台灣出口占 GDP 比例從 1960 年代開始逐漸升高，到 1978 年竟然超過 50%，而於 1986 年高達 58.1%！接著因台幣升值而略有下降，但在 2000 年仍有 54.2%。

若視為一個「國家」，這是相當獨特的現象。所有全國民眾辛苦忙碌工作，其所產出的最終商品與勞務有一半以上是為外國人而做的！固然這與台灣政府採取「出口帶動」的發展策略有關，但日本與南韓也都經由「出口帶動」來達到快速成長，而同樣的比例在南韓均為 40% 以下，最高達 39.4%（1987 年）。在日本最高則僅達 15%（1984 年）⁽⁴⁾。

為何台灣的出口占 GDP 比例會如此一枝獨秀特別高呢？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有趣問題。我們猜測，台灣在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與日本、美國所形成的「三環貿易結構」，以及 1990 年代與大陸、美國所形成的另一個「三環貿易結構」，應當是造成台灣出口居高不下原因。當然，同樣的「三環貿易」關係或多或少也發生在其他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但在台灣這個關係特別深切。就歷史觀點，這或許是因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在語言、習慣方面與日本合作較為順暢方便；而與大陸合作，在語言、習慣方面的密切，自不待言。

不管原因如何，出口占 GDP 比例如此高，表示台灣整體經濟景氣易受國際經濟情況影響。因此第一次能源危機發生引起全球性不景氣，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從 1973 年 12.8% 劇降到 1974 年 1.2%（見表 2）。其間相差幅度竟然超過 10%！

（二）進口能源依賴度高

跟日本一樣，台灣也是缺乏自產能源的國家。但台灣對進口能源依賴度相當高：進口能源占能源總供給的比例在 1970 年代是 71.9%，1980 年代 80%，到 1990 年代竟高達 95.6%。如此高的進口能源依賴度也是全世界少見的。因此能源危機發生時，台灣受到的衝

擊也特別嚴重，石油價格劇增導致的「供給面通貨膨脹」(supply inflation)，幅度要比其他國家來得大。

表 2 顯示，台灣 1973、1974 年的通貨膨脹率分別是 15.0% 與 32.4%；同一時期美國的通貨膨脹率是 5.6% 與 9.0%，日本則為 12.5% 與 20.8%。

(三) 台灣的工會勢力不強

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實施戒嚴令，示威遊行與罷工是絕對禁止的，因此工會力量並不強大，而使得通貨膨脹較易控制住。如此，當 1974 年通貨膨脹率漲至 32.4%，隔年 1975 年卻能迅速壓低至 2.3%。這是工會力量較強的西方國家不可能達到的。以美國而言，第一次能源危機把通貨膨脹率推上 9.0% (1974 年)。一旦有了高的通貨膨脹，要壓低下來很不容易，一直到 1982 年才壓低至 5% 以下。

工會力量不強使得通貨膨脹較穩定，而勞資雙方的和諧對經濟發展也有相當程度的助益。事實上，自 1960 年代以來這是台灣吸引外資來設廠的有利條件之一。直到 1987 年戒嚴令解除，工人才被允許示威、罷工。然事實顯示，跟西方國家與其他開發中國家比起來，自 1987 年以來台灣的勞資爭議事件仍算少而溫和的。

(四) 台灣的儲蓄率特高

台灣經濟另一明顯特徵是儲蓄率非常高。在 1950 年代毛儲蓄率約 10%，1960 年代超過 20%，1970 與 1980 年代更超過 30%，而於 1987 年竟然高達 37.9%。這也是舉世少見的，顯示台灣人民勤奮與節儉的一面。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儲蓄高可提供資金來進行資本累積。但如果儲蓄高於國內投資而產生超額儲蓄，也會引起總體經濟的失衡。1980 年代後半，貿易順差擴大而儲蓄率居高不下，過剩資金造成房

地產與股票價格暴漲，引發金錢遊戲狂潮，形成泡沫式經濟，影響整體經濟的安定。如前所述，政府的一項因應措施是於 1987 年解除外匯管制，疏導一部分資金外流，而使台灣成為東南亞國家的投資資金重要來源。

1990 年代，民眾的生活與消費型態逐漸改變，毛儲蓄率逐年下降至 2000 年僅有 25.4%。從長期觀點，尚難判斷這是值得警惕的趨勢，或僅是逐漸邁入已開發國家的一個正常現象。

IV. 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

台灣自 1895 年至 1945 年為日本殖民統治達 50 年之久。研究四小龍經濟發展成功的原因，有不少學者強調日本統治時期的貢獻，尤以台灣和南韓為例。但一般同意，這並非促成快速成長的必要因素，因為晚近馬來西亞、泰國、印尼以及中國大陸也都達到相當快速的經濟發展，而這些國家並沒經歷日本的長期殖民統治。

不過無可否認，日本統治對台灣戰後的快速發展有其正面影響。我們可歸納下列幾方面：

1. 日本剛佔領台灣時，基本方針是把台灣作為原料、糧食的供應基地，而台灣所能提供的糖與米正是當時日本所需的。自 1895 年以來，在日本的規劃經營下，台灣逐漸形成以糖、米兩大出口商品為主軸的農業經濟結構。1945 年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此種帶有殖民地遺制產業結構的經濟乃與大陸經濟產生互補循環作用。然 1950 年後台灣與大陸隔絕，因而被迫與素有深厚經濟關係的日本，透過通商貿易再度產生互補關係。

在整個 1950 年代，台灣的出口有將近一半依賴日本，而對日輸出的商品結構有 90% 以上為糖、米、香蕉與鳳梨罐頭等農產品，可見是承續戰前的特殊殖民地與宗主國結構關係。因此我們可說，台灣在 1960 年代「出口帶動」的經濟起飛之前，其對日本的糖、米輸

出與美援是維持經濟安定的兩個重要支柱。在此外匯短缺、資金不足的艱難時期，日本殖民統治所建立的特殊經貿關係，有其階段性的正面貢獻。

2. 1931年滿州事件之後，日本軍國主義色彩日漸濃厚。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將其海外擴張大幅轉向南進。此時台灣經濟乃隨著形勢演變，在迄今的「糖米生產基地」基礎上，又增加到承擔「軍需品生產基地」與「南進基地」的三重任務。因此台灣的殖民地經濟，由糖、米為中心的農業本位經濟，或多或少開始轉向以軍需產業為重點的「工業化」。

此「工業化」過程，基本上以開發電力為首，接著水泥、肥料、造紙、鋁、酒精、煉油、製鐵、機械等許多現代化工業陸續引進台灣。這個「工業化」政策雖因戰爭結束而中斷，然這些已建置的工業以及為了發展工業的一些相關基本公共設施，如公路、鐵路、港埠、電信及水利等，均為戰後推進工業化提供良好的基礎條件。與當時其他落後地區國家比起來，台灣在這一點上的確具備較有利的發展條件。

3. 日本在佔領台灣後不久於1898年即將日本語傳習所改制成公學校，對台灣人實施日本式教育。到了1939年決定開始實施義務教育時，已有超過53%的學齡兒童進入公學校。以1942年統計，學齡兒童就學率已達65%，而第一學年入學適齡兒童就學率更高達82%！⁽⁵⁾ 因此戰爭結束時，台灣的文盲率要比其他落後地區國家來得低。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繼續並擴大實施義務教育。

日本總督府及國民政府長期以來重視教育，對台灣的快速經濟發展有相當的助益：第一，這樣的政策產生一批數量大、工資低廉而素質高的勞動力，正是開創1960年代經濟起飛的生力軍。其次，戰前日本教育的普及，使這一代台灣人與日本人有共通語言、生活習慣等，對後來形成日本、台灣、美國的「三環貿易結構」有相當的促進作用。日本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或多或少形成類似的「三環

貿易」關係，但其密切程度並沒台灣這麼深刻。

4. 在日本統治下，以總督府為代表的國家權力深深地滲入殖民經濟體系各部門。台灣經濟長期被置於這種以總督府為核心的統制體制下，遂具有濃厚的受中央集權官僚統制的性格。而對本地人勢力，這種統治係通過保甲與警察制度併用來加以鞏固，因而其鎮壓與控制相當嚴厲。此種殖民地式的經營、統治使本地地主勢力相當「弱體化」。後來國民政府於 1949 - 1953 年實施一連串「土地改革」，本地地主階層對新政府並沒進行抵抗，而只逆來順受。因此國民黨在大陸一直無法順利實施的政策，卻在台灣一舉而獲得成功。從歷史角度來看，我們可說戰後的「土地改革」之能夠順利進行，在日本統治時代已為此提供了有利條件。

「土地改革」的順利完成，使自耕農比例大幅提高，到 1960 年農民的收益增加 3.9 倍，農民購買力亦大為加強。農村經濟穩定成長，農業盈餘轉為投資工業，而農村部門也提供大量勞動力，乃奠定了 1960 年代工業化的良好基礎。

V. 中國儒家思想與傳統的影響

自從 1842 年鴉片戰爭打開中國門戶以來，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足足一百多年期間，中國始終未能有像樣的經濟發展。而同一時期內，日本卻建立一個現代化經濟，成為列強之一。有不少學者認為或許中國儒家思想與傳統並不利於現代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制度的發展。從 Max Weber “rational bourgeois capitalism” 的觀點，他們大致提出兩點⁽⁶⁾：

1. 傳統中國「士農工商」的觀念，把商人放在社會最低階層。此種普遍不重視商人的態度難以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

2. 儒家重視「家庭」的觀念，也不利於建立有效率的現代化企業。在家族式經營下，往往優先僱用或提拔家人、親戚，而不是較

有能力的人。

因此二十世紀初期以來，學者們對於中國能否現代化都持悲觀懷疑的態度。然台灣快速經濟發展改變了這方面的看法 -- 中國的儒家思想與傳統並沒妨礙這驚人的經濟奇蹟。甚且，從更廣的角度來看，近四、五十年來在東亞快速發展的國家與地區，包括日本、南韓、香港、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的都會地區等，幾乎都是受中國文化影響或有較多中國人居住的地區。我們反而要問：是否儒家思想與傳統有利於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制度的發展？

從台灣快速經濟發展的回顧，我們可歸納出三點中國儒家思想與傳統有利於現代經濟發展的地方：

(一) 重視讀書與學位的態度

跟西方人比起來，中國以及東亞受中國文化影響地區的人民是比較重視讀書與學位的。這尤其反應在高中、大學與研究所入學考試的激烈競爭上。在台灣的一般學生，花在讀書（包括上補習班等）的時間比歐美國家同年齡學生要來得多。此種態度與風氣除了根源於孔、孟的基本教訓外，也因傳統科舉制度而根深蒂固 -- 自隋唐以來有一千五百多年，認真讀書而能在考試上有良好表現是一個中國普通老百姓能出人頭地的途徑。

由於這種態度與風氣，早期日本總督府與往後國民政府實施普及義務教育，都能得到一般人民配合而順利推行。後來隨著經濟發展，生活水準提高，除了基礎教育與大學教育外，一般人更是盡其所能爭取進入研究所讀取碩士、博士，尤其是前往美國留學。在 1960 年代與 1970 年代，台灣在美國留學生人數常位居世界各國留學生在美國人數之第一位。後來中國大陸開放與美國往來，大陸留學美國人數逐漸超過台灣而位居首位。

此種重視讀書與學位的態度與風氣，對台灣的快速經濟發展有

相當的助益：第一，在 1960 年代這表示台灣有一批數量大、接受過教育而素質高的勞動力；再配合著外來的資本與技術，乃造就成當時的經濟起飛奇蹟。其次，在 1970 年代與 1980 年代，當政府開始推動產業升級，往高科技產業發展，台灣也有相當數量接受過學士後教育的人才來達成這一階段的產業升級。

當然，歐美先進國家已有相當高的學術與工業技術水準。但這是一、兩百年來，長期逐漸累積起來的。就落後地區國家而言，在短期內要迎頭趕上，東亞地區國家重視讀書與學位的態度與風氣是一個重要的有利條件。

(二) 重視家庭的觀念

儒家傳統重視家庭，因此在台灣父母與兒女的關係顯然比西方國家密切。在經濟方面，把兒女培養到大學畢業，而幫兒女支付大學教育費用，一般視為理所當然。在大學畢業後，不管是繼續深造或開始就業，父母也常常對兒女有財政支援。不僅如此，隨著生活水準提高，財富逐漸累積，「為兒子買棟房子」的想法更是普遍。甚且有不少人，在為每一個兒子準備一棟房子後，也開始存錢準備為女兒買房子。

此種覺得應該為兒女買房子的想法是西方人所難以理解，然在台灣一般老百姓中卻是相當普遍的現象。這或許可追溯到稍早農業社會「長孫田」的習俗 -- 即做祖父的通常會留一塊田地給長孫為禮物。在較貧窮的農業社會，一般人辛苦積蓄一輩子留一塊地送給隔一代的長孫。到了 1970 年代、1980 年代，生活水準提高，儲蓄也增加，這樣的習俗不知不覺慢慢演變成「為自己的長子買一棟房子」，「為自己的每一個兒子各買一棟房子」，或甚至「為自己的每一位兒女各買一棟房子」。

前已提及，傳統上學者強調中國人過於重視家庭與家族是妨礙現代化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以台灣經驗來看，這個缺點的確

是無法避免的。但從另一角度來看，父母與兒女關係密切有助於儲蓄率的提高。一般老百姓除了為自己的養老、生活上的不時之需而儲蓄外，也為兒女的教育費用（大學與研究所等），甚至為了準備幫兒女買房子而儲蓄。這是台灣能有如此高儲蓄率的重要原因。而這麼長期而高水準的儲蓄率，對於資本累積自然有相當大的貢獻。

（三）儒家思想強調「秩序」與「和諧」

孔子生於亂世，而在其教導中強調社會的「秩序」與「和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君王的，做臣下的，做父親的，做兒子的，每個人在國家社會中做他所應該做的事，扮演他所應該扮演的角色。這種人生觀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多多少少促進了勞資雙方的「和諧」。以台灣為例，在 1987 年戒嚴令解除之前，所有示威、遊行、罷工都是禁止的。但在 1987 年以後，勞資間的爭議也不多見，比起西方國家要和諧多了。此種勞資間的和諧對台灣的快速經濟發展，顯然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西方國家強調「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與「競爭」的精神，這頗有助於「創新」(innovation)，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制度繼續發展的重要原動力。但對於落後地區的國家，要想能夠經濟起飛，短期內提昇生活水準，說不定「和諧」比「競爭」來得重要。就此點，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也提供了一個有利於現代經濟發展的條件。

VI. 結語

本文從經濟、社會與歷史等層面來探討影響與促進台灣快速經濟發展的因素。我們特別綜合幾項，即：（1）在不同時期政府所採行適時而明智的措施，（2）國際間有利的外在因素，尤其是與日本、美國及大陸間的密切關係，（3）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與（4）中國儒家思想與傳統的影響。

如今剛跨入 21 世紀，在經歷了長達半世紀持續不斷的快速成

長後，台灣經濟在短短一年內卻陷入前所未有的不景氣。依主計處初步統計，2001年前2季經濟成長率分別為0.91%與-2.35%，整個上半年破天荒呈-0.73%之負成長。而在1953-2000年整整48年期間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高達8.3%，即在最近2000年亦有6%之成長（見表1與表2）！

有關這次不景氣的原因與對策，在報章雜誌以及為期月餘的「經發會」討論中，已有不少人提出許多精闢的分析與寶貴意見。本文藉著整體歷史回顧，盼能省思當年、環顧現狀，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想想當年政府遷台初期百廢待舉、條件惡劣，卻能創造經濟奇蹟。如今的台灣無論基礎建設、人力素質、科技水準與外匯存底都遠勝昔日，卻墜落深不可測的頹勢。

在此晦暗困境中，如何能撫今追昔，集思廣益，共同營塑一個新契機、新環境，把台灣經濟推上另一波快速發展的軌跡，這將是對目前「接棒者」群一項劃時代的挑戰。

附 註

- (1) 即實質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之成長率。
- (2) 事實上在 1950 年代即有些日資企業，如製藥業，從日本進口半成品，在台灣進行簡單包裝，再就地銷售。1960 年代初，日本各大機電公司也開始開闢台灣市場，大多與本地資本合資。其經營方式，由日本公司提供技術設備，從日本進口原料和半成品，經合資企業加工裝配，成品主要在本地市場銷售，如機車、電視機、電冰箱、日光燈、耕耘機、變壓器等。1966 年隨著「加工出口區」的設置，日本對台投資從占有本地市場轉向利用台灣廉價勞動力拓展第三國市場。
- (3) 見劉進慶（台灣漢譯版、1955）P. 344。
- (4) 香港與新加坡的出口占 GDP 比例更高，甚至超過 100%。但這是因為香港與新加坡是重要轉口貿易港，在統計上把這些轉口貿易也算是「進口」與「出口」。這些「出口」並不一定是在當地生產，因此不能與一般「國家」做出口占 GDP 比例之比較。它們僅是「城市」，沒有農業部門，而又恰好是重要的轉口貿易港口。
- (5) 見涂照彥（漢譯版，1999），P. 140。
- (6) 見 Perkins (1975)。

參 考 文 獻

李國鼎「台灣經濟發展成果與面臨問題」(1993年6月在大連「中國整體經濟革新國際研討會」之演講、全文刊於1993年6月13日『中國時報』)

李國鼎、陳木在『我國經濟發展策略總論(上、下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1994年9月)

段承璞編著『台灣戰後經濟』(中文繁體字版、人間出版社印行、1994年7月)

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灣漢譯本、人間出版社印行、1999年2月)

袁穎生『光復前後的台灣經濟』(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1998年)

葉萬安「台灣經濟發展階段性之回顧」(『台灣經濟發展方向及策略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76年8月)

葉萬安「一九八〇年代以前的經濟發展回顧」(施建生編『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發展經驗』、中華經濟研究所、1999年)

隅谷三喜男、劉進慶、涂照彥『台灣之經濟』(台灣漢譯本、人間出版社印行、1995年4月)

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灣漢譯本、人間出版社印行、1995年4月)

Jacoby, N. H. *U.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7.

Perkins, D. H.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Univ.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75.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58.